

读史忆人 典故

“三自”和“三不”

为增进统一战线内部团结，1959年底，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有将近2000名工商界人士参加大会。李维汉在他们开会前和会议过程中，多次同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黄炎培、陈叔通等谈话和举行座谈，建议并帮助他们改变那种程式化的开会方法，不要搞什么检查过关，而应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的办法开会。就是要创造一种氛围，让大家都讲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敞开心扉，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要开好“神仙会”，就必须贯彻“三自”和“三不”的原则，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

会议开始时，云南省工商联秘书长聂叙伦等几位代表发言后，曾遭到一些与会者的抨击。李维汉知道后，专门请聂叙伦等人吃饭，对他们说：“我工作很忙，要我来听人讲假话，我是不高兴的。何必浪费时间呢？今天你们是在讲了真话的，是不是够，我不能说，但这是好的。你们对党讲真话，够朋友！”又说：“做到大家都讲真心话，应该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思想上还应该有个准备，就是自己反映出来的情况，不一定全面，将来如果有出入，怎么办？改就是了。”李维汉的一席话，使聂叙伦等人消除了心理压力，也使与会代表们受到了鼓舞。

在“三自”和“三不”原则的指导下，与会的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了顾虑，敞开了思想，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会上讨论，会后自由结合漫谈，走廊里、饭桌上，到处都在交谈、争辩，相互间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人人心情舒畅，实现了自我教育、共同提高的目的。黄炎培高兴地说：“我们的预备会议开得十分生动活泼、细致深入。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等于进了两个月的社会主义学校，等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过了两个月的丰富多彩、心情舒畅的集体生活。”

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刘少奇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并同民建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人举行了座谈。他重申了党的“包一头，包到底”的基本政策，号召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对于定息问题，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七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时可留尾巴。对于高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高薪不降，调职不减薪，减者补发。总而言之，工商界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要负责到底，包到底。刘少奇的讲话进一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

“三自”和“三不”原则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成功运用后，进一步在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上得到推广。1960年夏，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有1800多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可以说，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的会议。这些会议同样采用了“神仙会”的方式，贯彻了“三自”和“三不”原则，开了两个积极性，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教育改造的积极性，都取得了成功。

(据统战新语)

拾遗

雍正：为如何处理剩粥剩饭下圣旨

雍正继位后，曾大力倡导节约粮食。雍正二年(1724年)，他发出圣旨晓谕膳房：凡是粥饭肴饌，吃过后如果有剩余，切不可抛弃沟渠，倒是可以喂给役的下人食用；凡是人不可再食用的，则可以用来喂猫、喂狗；如果连猫、狗都不吃的，那就把它们晒干用来喂养禽鸟，总之，剩饭剩菜断不可随意丢弃，朕将派人稽查。违反者必定治罪。雍正为节约粮食可谓费尽心思，从人食、猫食到鸟食，交代得清清楚楚。

皇帝专门为剩粥剩饭的处理下一道圣旨，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大概绝无仅有。然而，雍正皇帝似乎乐此不疲。时隔三年，他又专门为禁止浪费粮食的事，再次发出一道圣旨：上天降生五谷，养育众生，人们依赖这些活命，哪怕是一粒粮食，也不可轻易丢弃；太监煮饭时，可少下些米，宁可稍有不足，切不可多煮，以免剩粥剩饭，不懂得爱惜；各处首领、太监，见有米粟饭粒，应当捡起；如果谁丢弃米谷粮食，无论首领、太监，重责40大板。雍正对节约粮食一事，既有号召，又讲道理，既有具体办法，又有惩治措施，算是一抓到底了。

(据《天津日报》)

朱自清：把新婚大鳖当了买书

1920年，朱自清即将在北京大学毕业。一次，他到琉璃厂逛书店，见到一部新版的《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14元。朱自清手头没这么多钱，可书又实在喜欢，思来想去，发现自己只有穿在身上的皮大鳖还值点钱。这件大鳖原是其父送给朱自清的新婚礼物，水獭领，紫貂皮，制作的时候很费了些心力。来到当铺，朱自清没有过多考虑，想着将来能够赎回，便以书价作当价：14元。大鳖当不了这个价，所以当铺的人一点儿不为难，即刻付款。

拿上钱，朱自清马上去把那本《韦伯斯特大字典》抱了回来。不料那件费了父亲不少心力的大鳖，却最终没能赎回。后来，朱自清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朱自清没有钱缝制棉袍，便到街上去买了一件马夫用的毡披风。这件粗糙的毡披风由于太过显眼，成了教授生活清贫的标志，此后也多次出现在朱自清朋友的笔下。

(据《天津日报》)

汤一介夫妇“儒道互补”

古代文化基础好，有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汤用彤是一代国学大师，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融会中西、接通华夏、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乐黛云外文好，接受新思想、新信息多，两个人也是互补。两个人有共同的理想，都想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都喜欢帮助别人、都喜欢看文学书，听西方古典音乐。他们共同出了一本随笔集，是“连理丛书”中的一种——《同行在末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他们希望在广阔的天地里，比翼齐飞。

2014年9月9日，汤一介去世，乐黛云写了一副挽联：“末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随”，向一起走过60载风雨的爱人深情告别。

(据《人民政协报》)

建立精干高效的指挥机构

我军的高级统帅机关，自革命战争时期以来就是以非常精干高效的班子进行运转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最高统帅机关仍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总参谋部实际上还是由陕北带来的那个小而精干的班子，人数很少，总共只有20多人。抗美援朝战争中，第13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改组为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组成了志愿军总部。总部机构很精干、灵活。司令部只有作战、情报、通信、军务、机要、直工、行政七个处和一个办公室，政治部只有五个部(处)。这样安排，既保证了作战指挥的集中统一，又能够充分发挥一线将领的核心作用和集体智慧。

作为志愿军总部前身的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的建立虽然可谓一波三折、几经调整，但这却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进行配备的。

慎重选择参战部队

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国防前哨，而当时东北边防力量薄弱，在敌人进攻面前，如果不成立东北边防军进行制止，不仅朝鲜有沦亡的危险，我国大陆的和平建设也将无法进行。成立东北边防军我们就有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基于对美国干涉和朝鲜战争持久化的预期判断，果断决策以第13兵团为主成立东北边防军。毛泽东这艘堪称用兵典范的战略预置，为取得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稳定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看来仍极具战略眼光。

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时期只有陆军一个军种，依靠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知，我军即将面临的现代战争形态与之前是完全不同的。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力量非常弱小。毛泽东慎重考虑了使用空军的需要与可能，眼前使用与长远建设的关系，权衡利弊后毅然作出了空军参战的决策。在战法打法上，毛泽东肯定了刘亚楼提出的不能零零碎碎地去同敌人进行拼消耗的空战，应积蓄起来选择适当时机集中分批地使用的原因。

则。志愿军空军在2年零8个月的作战中，取得了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的重大战果，创造了让敌心惊胆寒的“米格走廊”，在掩护后方重要目标安全、保障后方交通运输的畅通和开创我军多军种协同作战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为什么在第一次战役后，调驻扎在上海的第9兵团进入东线战场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与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谈话中得到解答：军委要用人所长，要用部队所长，解放战争你兵团练就了一身的硬骨头，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之一，现在用你兵团的目的就在于此。毛泽东这里的“用人所长”是指，宋时轮曾是华野十纵的司令员，而他带领的十纵，有号称“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美誉；“用部队所长”是指，第9兵团下辖的3个军都是我军的王牌部队。毛泽东认为，既然陆战1师号称美军的头号王牌，那么我们也派出解放军能打硬仗的王牌，来一个“王牌对王牌”。事实也证明，在接下来的长津湖战役中，9兵团给美军以巨大打击，展现了顽强能战的战斗精神。

(据《学习时报》)

抗美援朝中毛泽东如何调兵遣将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谁来打”既是用人问题，也关乎战争能否打赢。无论是选配主要指挥员、建立指挥机构，还是挑选作战部队，毛泽东都慎重考虑与决策，体现了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

选配骁勇善战的高级指挥员

对于出兵朝鲜，毛泽东虽有充分考虑，然而由谁挂帅出征，却是颇费了一番思量。他首先想到的是粟裕，可当时粟裕有病缠身正在调养，一时无法到任。时间和局势变化不等人，毛泽东最终想到在大西北主政的彭德怀。虽然当时西北形势仍然紧张，调离彭德怀也是万不得已，但毛泽东深知彭德怀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经过简单沟通，彭德怀很快领会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欣然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命。入朝前彭德怀曾打趣自己是命中注定要和苦地方打交道，并说：“我们共产党人注定要和‘苦’字、‘穷’字打交道。没有穷、苦，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正是具备了这种为人民出生入死、不惧艰难困苦的品质，这场“开国第一战”的历史重担才由他来承担。

毛泽东认为，现代战争的指挥员要具备高于常人的战略眼光，才能更好地将指挥军事行动放在全局盘子里进行谋划。毛泽东选定的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身上，就鲜明体现了这种宝贵的战略素质。在最初接受任务时，彭德怀就认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入朝前，第13兵团将领曾联名致电彭德怀：在缺少高射炮又无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出兵朝鲜的行为弊多利少，建议推迟出动到空军能够出动、装备确有保证的时候。彭德怀怎不知没有空军掩护的仗有多难打，但他下定决心要和敌人抢时间。为此，困难再多、再大也要出动，否则将会更被动。正是因为彭德怀能在复杂战场形势下保持清晰判断，坚定执行中央战略决定，及时排除杂音，才使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几次战役迅速改变了战场局势，打乱了敌作战部署，使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方手中。

毛泽东认为，将无勇则不为将。他选择的挂帅抗美援朝的将领都是战功赫赫、威望极高。比如粟裕，他素以骁勇善战著称，军事素养极高，又足智多谋，在解放战争中因“七战七捷”被称为“战神”，无疑是作为胜战核心之不二人选。最终挂帅的彭德怀，他带领西北野战军以少胜多，“三战三捷”保卫党中央的佳话一直传颂，毛泽东用“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高度评价了彭德怀的卓越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由他挂帅，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志愿军当时的一些弱点。

中国首台电扇谁造的？洋布店学徒

诞生于1915年，后创办华生电器厂，1924年开始批量生产

世界上第一台电风扇 美国人1880年发明

第一台现代意义的风扇，是美国人詹姆斯·拜伦于1830年发明的机械风扇。詹姆斯·拜伦受到钟表发条结构的启发，发明了一种可以固定在天花板上、用发条驱动的机械风扇。这种风扇的缺点是使用时必须爬上梯子上发条。

世界上第一台依靠电力的电风扇是美国人舒乐于1880年发明的。直接装在电动机上的叶片，在电力的驱动下飞速转动，阵阵凉风扑面而来。但舒乐发明的电风扇没有成

为商品。1908年，美国埃克发动机及电气公司成功研制出世界上最早的齿轮驱动左右摇头电风扇。1922年，汉密尔顿·比茨公司生产的“家庭”牌电机被用来驱动缝纫机，后来也成功地用于电风扇，从此电风扇逐渐遍及世界。

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风扇面罩的设计。面罩的出现，一方面是考虑安全性，另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风向。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发明了花瓣式面罩，英国韦伯利公司发明了百叶窗式面罩。

中国第一台电风扇 诞生过程颇为波折

中国第一台电风扇的诞生和发展，可谓颇多波折。中国第一台电风扇的制造者是杨济川等人。1897年，16岁的杨济川在上海一家洋布店做学徒，他经常利用工余时间试制各种小电器。后来，杨济川结识了洋行职员叶友才和木行跑街袁宗耀，三人决定共同研究试制家用电器。

研发需要资金支持，于是他们找到苏州电灯厂的大股东祝兰舫商谈。祝兰舫要求他们先研发出一款有足够说服力的产品，再进行下一步的考虑。

他们拼凑资金，购买了一台美国奇异牌电风扇及原材料，着手进行仿制。没有加工力量，他们就请白铁店、铜匠铺等工匠协作，电风扇的电气装配则由杨济川自己动手。1915年，经过半年时间试制，他们终于成功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电风扇。此台电风扇高53厘米，宽44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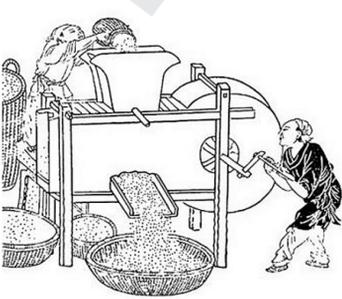
米，如今收藏于宁波市镇海区宁波帮博物馆内。

借由祝兰舫的投资，杨济川等创办了华生电器制造厂，并于1924年开始批量化生产电风扇，当年便生产了4000余台，主要在上海地区销售，并且注册商标“华生牌”。华生电风扇一炮打响，震动了外商。当时处于独家经营地位的美商慎昌洋行向华生电器厂提出，愿意出50万美元，买断华生品牌，遭到了华生电器厂的拒绝。

新中国成立后，华生厂在生产电风扇的同时，恢复制造交流发电机、电动机和变压器。在华生牌电风扇的引领下，蝙蝠、菊花、长城、骆驼、钻石、金龙、长风等一大批国产电风扇品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为中国的千家万户在夏日里送去阵阵清凉。

(据《厦门晚报》)

炎炎夏日，吹风纳凉自然是极好的享受。在空调未诞生前，电风扇曾是家家户户纳凉的首选。今天空调虽已普及，但很多人依然对电风扇情有独钟。电风扇的出现自然离不开电的发明和利用，但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古人已发明旋转风扇，只不过不用电驱动而已。中国第一台电风扇的诞生更是颇多波折。



早期国外的机械风扇。中国古代用于清选谷粒的风扇车。

中国古人发明旋转风扇 以人力驱动可纳凉散香

中国古代最早用于纳凉的旋转风扇，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长安巧工丁缓发明的七轮扇。据汉代刘歆所著《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也有资料说径尺)，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室寒颤”。这种人力风扇可视作现代化风扇的鼻祖。尽管没有七轮扇的图片留存，但从寥寥数语的描述可以看出，丁缓所发明的七轮扇大抵是将七个扇叶安装在一个轴上形成轮扇进行鼓风，以人力驱动，威力不小。

事实上，丁缓所发明的七轮扇很可能是在汉代流行的农用工具——风车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西汉时期《急就篇》记载，当时清选谷粒曾利用风车等设备产生连续或间断的人造风，壳轻谷粒重，风车在转动过程中产生的风，可以把谷壳吹远，谷粒就留了下来。从汉代

出土的风扇车模型看，后世风车的重要部件，包括机体、风箱、叶轮、手柄、曲轴、出料口等，当时都已具备。

古代的旋转风扇，是农民手中的生产工具，亦是公子王孙青睐的消暑神器。根据史料记载，宋代宫廷中便安置有轮扇，多被称为“风轮”。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记载，“茉莉、素馨、百合，夏日宜多置，风轮一鼓，满室清芬。”可见古人所用风轮，不仅纳凉，还兼散香之用，为倍感烦闷的夏日带来款款香风，安神助眠。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旋转风扇逐渐从宫廷走入民间。清代文人曹庭栋在《养生随笔》中亦谈到“暑天室有热气，非风不驱。办风轮如纺车式，高倍之，中有转轴，四面插木板扇五六片。令人举柄摇动，满室风生，顿除热气。”